

再现过去：

社会史的理论视野

蔡少卿 主编

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

蔡少卿 主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

蔡少卿 主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萧山东湘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25 插页2 字数23万

1988年10月第 1 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550

ISBN 7-213-00313-5/K·69

定 价：3.30元

序言

人们普遍感到，80年代中国的历史学正面临着危机。固然，改革的时代在呼唤更能适应其需要的历史学；但就历史学本身而言，危机的出现则反映了人们对以往史学研究的反思，和其他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渗透和冲击。惟其如此，所谓“史学危机”正是史学发展的契机，它体现了历史学家们急欲摆脱以往史学研究的困境，寻求史学变革和创新的愿望。于是，当一个新的史学领域——社会史勃然而兴，日渐醒目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时，就立即引起史学界的普遍关注。

在历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里，社会史的历史不算太长，如果把1929年法国历史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创立的《经济社会史年鉴》杂志视为社会史的开端（西方学者认为，19世纪社会史研究即已出现），至今也不过半个多世纪。在中国，二三十年代就有了社会史的研究，那只是对一些社会史课题的了了陈述，还谈不上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突破。其后，中国社会史研究始终处于不被重视和不自觉的状态。现在，在“史学危机”之际重提社会史研究，带给对中国史学发展有所期待的人们的，犹如一门陌生的新学科，对它既感兴奋又感犹疑，既是新奇又是迷惘。对诸如为何研究社会史？何谓社会史？提出种种疑问势属必然；由这些问题触发的思考，乃至争

论亦非怪事。无疑，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展开，需要首先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事物的消长总有其内在和外在的依据，社会史研究的勃兴也是这样，它不是哪个人振臂一呼即能出现的，而是近十年中国历史学发展的结果，是中外史学交流的结果，它符合当代历史学演进的内在逻辑。

就世界范围来说，在二次大战以前，社会史还仅属于几个具有开拓精神的历史学家个人耕耘的园地，社会史在各国历史研究中所占的比例，比起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等要小得多。但是，到了战后，由“年鉴派”先行者培育的社会史幼苗，便迅速成长起来，其影响所及，远远超出法国。50年代英国和美国出现了社会史研究的势头，1958年，《社会和历史的比较研究》专门化社会史杂志在美国诞生，不久，又出现了《社会史》杂志。这一时期，英美的“新社会史”很引人注目。与此同时，日本和其他国家的社会史研究也有相应的发展。及至今日，社会史研究在西方国家已是硕果累累，所涉及的问题包括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并对一些重大社会变迁问题（如工业化）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可以说，社会史已使历史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宽，与其他社会科学（如人类学、社会学等）的交往也日益密切。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社会史在许多方面已改变了“灰姑娘”的面貌。英国著名的社会史专家哈罗德·珀金深有感触地写道：“灰姑娘变成了一位公主，即使政治史和经济史不允许她取得独立地位，那么她也算得上是历史研究中的皇后。”不管有多少人对社会史持有异议，但其取得的成绩却是无法遮掩的。我们看到，在西方社会史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历史学家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不仅捍卫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还写出了一批很有水平的著作，如E·J·

霍布斯鲍姆的《原始造反者》（1959年）和《土匪》（1964年）、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等，这些著作，都是可以彪炳当代世界史坛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展开，不能漠视国外同行的研究，恰当地借鉴其成功经验，汲取其有用成果，对我们会有很大的裨益。为此，我们从西方有代表性的社会史专家的论著中，选译了十七篇文章，编成这本集子，献给有志于社会史研究的同仁和对此感兴趣的广大读者。

这本集子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它反映了西方社会史发展的梗概和当代西方社会史的研究趋势。从本书可以看出，70年代以前，西方社会史主要集中于人口与家族血缘关系、社会运动、阶级和社会团体、社会和集体意识、城市、社会变迁等问题。70年代后，由于新技术的发展以及不断借用其他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使社会史研究的范围更加广泛，问题探讨越来越精细。在这方面，美国的社会史是着先鞭的。如果“年鉴派”的力作大多论及近代以前欧洲中世纪社会，英国“新社会史”的力作大多集中于早期工业化前后的欧洲社会，那么，美国社会史研究无论是地理范围，还是年代分布，都比前者大大进了一步，有的研究已触及当代问题。总之，当今西方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和课题，已呈现出多样化趋势。

（二）介绍了西方历史家关于社会史的定义、范畴和方法等问题的论争。自从G·M·屈维廉把社会史界定为“除去政治的人民史”以来，关于社会史的概念之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直至1985年英国《今日历史》杂志还专门组织了五位作者的文章加以讨论。时至今日，尽管社会史还未形成一套系统精密的理论和方法，但社会史的实际研究已远远走在前面了。

(三)比较集中地介绍了法、英、美等国社会史学者研究的成果。虽然,社会史在日本、西德等国的史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但这些国家的社会史研究,在方法更新和领域开拓上,远不如法、英、美。就西方社会史研究的全局看,英、法、美三国已处于遥遥领先地位。

(四)明确阐述了社会史与其他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的关系。社会史的发展仰赖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这方面它与社会学的合作最密切。社会学对历史学的渗透,产生了一门边缘学科——历史社会学。

限于篇幅,这本集子不可能囊括整个西方社会史的情况,但这些文章大致勾勒出西方社会史研究的概貌,留心本书书名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再现过去”是我们编译这本书的主旨,因为它正是西方社会史学家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目下,中国社会史研究方兴未艾,社会史研究的生命力不象那些“微观”史学仅仅关注于历史的细枝末节,也不象那些“宏观”史学仅仅重视重要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变化,它的努力不管是“全面的”、“总体的”,还是“局部的”、“片面的”,都服务于再现过去社会生活的目的,而且,它不是希腊神话中“密纳娃的猫”,永远向着过去,为过去而再现过去,它的着眼点是现在和未来,通过再现过去,映照出我们生活的未来图景。马克斯·韦伯说得好:“未来如同历史!”

本书的编选审阅,南京大学社会史研究室的孙江同志帮我做了不少工作。

由于水平限制,译文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蔡少卿

1988年4月于南京大学

目录

序言	蔡少卿
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	1
〈英〉E·J·霍布斯鲍姆	
当代西方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势	22
〈美〉G·埃利	
拓宽视野：美国社会史研究的趋势	31
〈美〉彼得·N·斯特恩	
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	48
〈法〉费尔南·勃罗代尔	
社会科学方法与“全面的历史”	79
〈法〉F·菲雷	
新史学	92
〈法〉雅克·勒高夫	
社会史	123
〈英〉哈罗德·珀金	
何谓社会史	145
〈英〉J·布雷维里等	

社会史与政治：一个唯物主义的观点	154
〈美〉史蒂夫·霍赫施塔特	
社会史为何忽视政治	166
〈美〉杰夫·埃利、基思·尼尔德	
民俗学、人类学与社会史	184
〈英〉E P·汤普森	
在社会学与历史学交叉点上	207
〈美〉查尔斯·蒂利	
从历史社会学到理论历史学	226
〈英〉G·S·琼斯	
马克斯·韦伯的历史观	240
〈美〉冈瑟·罗恩	
历史社会学的产生和研究方法	249
〈美〉西达·斯考克波尔	
重建欧洲的生活	272
〈美〉查尔斯·蒂利	
近代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方法	297
〈美〉威廉·T·罗	

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

〈英〉E·J·霍布斯鲍姆

本文旨在观察和分析，而不是说明个人的信条或表述作者的偏爱和价值判断（作者明确说明之处除外）。我一开始就指出这点是为了将本文与其他一些史学论文区别开，这些论文是用以为其作者的观点辩护的，而当前这在社会史领域里恰好是不需要的。指出这点的另一目的也是为了避免特别是在讨论意识形态问题时常见的两种谬误，所有关于社会史的讨论都会碰到这两种谬误。

第一个谬误是把作者与其所持论点区别开来，除非作者明确否认这种区别，有时即使作者明确否认这种区别而实际上并未区别开。第二个谬误是把研究的思想动机或政治动机及其功用同研究的科学价值混淆起来。在思想倾向或偏见造成浅薄或谬误的地方（这在人文科学里是屡见不鲜的），我们就能畅快淋漓地斥责这种动机、方法和结果。然而，如果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仅为一些人所左右，在所有公开的，甚至私人的问题上赞同或同情他们的看法，那么生活就太简单了。目前社会史研究方兴未艾，研究者不会在意被说成带有同时代人的思想烙印，不过，比弄清作者态度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史经过二十多年没

有系统的大发展后，找到今日社会史的位置及其走向。

—

社会史这一术语一直难以界定，近来已无界定的必要，因为社会史缺乏通常进行精确界定的惯例上和专业上的前提。广义地说，直至目前社会史盛行——或者说至少是在社会史的名义下——社会史这一术语过去是在三种有时重叠的意义上使用的。第一、社会史是关于穷人或下层阶级的历史，特别是关于穷人运动（“社会运动”）的历史。这个术语甚至可以再专门化些，它基本上是关于工人和社会主义思想和组织的历史。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社会史和社会反抗或社会主义运动史的联系十分紧密。一大批社会历史学家被吸引到这个主题上，是因为他们是激进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对于与他们有很大情感关系的主题感兴趣。

第二、社会史这一术语常常是指一些对于人类活动的不同性很难划分，除非用这样一些词：“生活方式、风俗、日常生活”的著作。也许是因为语言学的原因，这是一个非常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用法，因为英语中没有适当的词对应德语称作“文化”（Kultur）或“风俗史”（Sittengeschichte）的词——这经常也是相当肤浅的新闻记者的方式——这种社会史并不特别指下层阶级（的确相当对立），尽管多数政治激进派的实践者关注下层阶级。下层阶级形成了被称为社会史经典观点的没有明说的基础，这就是G·M·屈维廉后来在他的《英国社会史》一书提出的社会史是“除去政治的历史”，这种观点无需评论。

社会史的第三层含义一定是最普通的，并且与我们的目的

关系最密：“社会”常常与“经济史”合用，必须承认，这种结合中经济所占篇幅大大超过一半。在其他社会史相应的领域里，还没有大量的关于不同国家、时期和专题的经济史著作。事实上，并没有太多的经济和社会史著作，在1939年以前，人们可以想起的仅有几本这样的著作，他们是公认有影响的作者所写，而专题性的或分析的著作则更加罕见。然而，不管历史专门化的一般领域的定义，还是更加专门化的经济史标志如何，经济和社会的习惯分类是有意义的。

它表明历史系统化的方法不同于古典兰克式的方法，使得这类历史学家饶有兴味的是经济发展，而这之所以使历史学家们感兴趣，正如乔治·阿尔温所说的，是因为它向社会结构和变化中投进了一束亮光，特别是在阶级和社会团体的相互关系上。这种社会尺度即使在大多数狭隘或谨慎的经济史学家的著作中也是明显的（只要他们自称是历史学家）。E·克莱芬认为在历史的所有特性中，经济史最为根本，因为它是社会的基础。我们可以认为，在这种结合中，经济凌驾于社会之上是有两个原因：一部分原因是经济理论的观点拒绝把经济从社会、制度和其他方面独立出去，如马克思主义者和德国历史学派；一部分原因是经济学的产生早于其他社会科学。如果历史必须纳入社会科学之内，那经济学是与历史最先结合的一个学科。人们也许进一步认为，无论人类社会中经济和社会是怎样根本不可分离，任何对人类社会进化的历史研究的分析基础必须是社会生产过程。

直到50年代，关于社会史的三种解释没有一个形成社会史的专门的学术领域，尽管一度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的著名《年鉴》杂志，在它的副标题上把经济的位置减为一半，并自称为纯粹的社会史年鉴。然而，这是战争年代的暂时

转向，这个著名的杂志在四分之一世纪广为人知的标题是《年鉴：经济、社会、文明》，同其内容的性质一样，这基本上反映了其创办者的初衷及其深远的意图。1950年以前，对这一主题本身和它涉及的问题的讨论都没有很大进展，其中专门化的杂志为数极少，直至50年代末才有了专门杂志：我们也许可以把《社会和历史的比较研究》（1958年）看成是第一个专门化杂志，因此，社会史学术专门化是为时甚短的。

用什么来解释过去的二十年内社会史的迅速发展并不断地摆脱束缚呢？这个问题应该在社会科学的学科内，根据方法和惯例的变化予以回答：经济史审慎的专门化正适合迅速发展的经济理论和分析的需要，“新经济史”即是一个例子；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和时尚引人注目的世界范围的扩大，同那些由经济学知识提供的需要相似，被称为附属的历史学分支。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因素。许多历史学家（如马克思主义者）过去给自己贴上经济学研究的标签，这是因为他们有兴趣的问题并不能得到正统世界史的认可甚或考虑，这些人发现自己被挤出日渐狭隘的经济史，从而接受或欢迎“社会历史学家”的头衔，尤其是假如他们的数学知识很差的话更是如此。不管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氛围怎样，象R·H·托尼这样一些经济史学家（假如他是一个年轻的研究者，而不是“经济史学会”主席的话）将永受欢迎是不可能的。然而，这种学术再界定和专业的变化几乎不能做太多的解释，尽管它们是不能忽略的。

当回顾它们之间这时出现的最重要的发展时，更有意义的是发生在这期间的社会科学的普遍历史化。我现在的目的并不需要解释这种变化，但是，阻止人们将注意力转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政治和经济的解放的巨大意义是不可能的，这引起政府、国际机构，还有社会科学家对历史转变的根本问题的关

注。这些课题一直被排斥在社会科学正统观念之外，或者至多只在其边缘，并且越来越多地为历史学家们所忽视。

无论如何，基本上说历史问题和历史概念（当就“现代化”或“经济增长”来说，有时是近乎粗糙的概念）甚至已经占据了迄今与历史最接近的学科，正象对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社会人类学一样，事实上并不是激烈敌视它。历史学的这种不断渗透在经济学上也许反映最为明显。简而言之，除了与社会结构及其转变没有联系的琐碎的生活方式之外（没有社会的历史），历史学家现在不可能从事社会科学家的许多活动。这是一个奇特的悖论，经济学家们正开始探索对社会（或至少是不严格的经济）因素的认识时，与此同时，经济史学家们却吸收了十五年前经济学家的模式，试图通过忘掉有关方程式和统计数字的每一个概念来使自己能够看得更为深入。

通过对社会史研究发展状况的简短回顾，我们能总结出什么呢？经过思考，它不能对这个课题性质和任务给予恰当的指导，尽管它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或多或少相异的研究课题，会松散地会聚在这个总标题下，和其他社会科学奠定的一种象这样被特别分界的学术理论的基础有多大发展，以及它多则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暗示，少则也值得立即引起我们的注意。

对以往社会史的考察似乎表明，这一领域里最有成就的人总是对这一术语感到不满。他们要么象那些使我们得益匪浅的伟大的法国人一样，宁肯把自己只说成是历史学家，把“总体的”或“普遍的”历史作为自己的目的；要么象那些试图寻求使历史学中所有有关社会科学成为一体的人，而不是代表其中任何一个学科。马克·布洛赫、费尔南·勃罗代尔、乔治·列菲弗尔这些社会历史学家的名字不是可以束之高阁的，除非他们接受寇兰支(Fustle de Coulange)陈述的“历史不是过去

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累积，而是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

不象经济学或其他用连字号连接的历史，社会史从来就不可能是一个专门化学科，因为它的主题不能孤立起来。至少为了分析的目的，我们可以把某些人类活动界定为经济活动，然后历史地研究它们。尽管这或许是（除了某些限定的目的）人为的或不现实的，但它不是行不通的。

二

让我们从过去回到现在来考虑撰述社会史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社会历史学家能从其他社会科学家那里获取多少东西，或者就过去而言，他们的课题多大程度上是或应该仅仅是社会的科学。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尽管过去二十多年内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很明显，自1950年以来，社会史的形成和进步不仅得益于其他社会科学的专业结构、方法和技术，而且也得益于它们所研究的问题。

也许，与第二个趋势最相关的不是集中而是转变。尽管现在有些来自其他学科的社会科学家已经使自己完全成为我们领域里受人尊敬的专家，但是，大多数人仅仅应用一些粗糙的机械概念和模式。简单地说，目前这种状况是，历史学家需要的是教而不是学。社会的历史不能依靠运用其他科学内容贫乏的现成模式来写，它需要架构恰当的新的模式——或者起码（马克思主义者这样认为）需要把现有的框架发展成模式。

当然，这不是真正的技术和方法，除了一、二点能够顺便谈到之外，我不希望讨论关于社会的历史这方面的问题。要判断我们占有的资料的性质，没有发现的技能，没有统计数据，没有掌握大量的论据，我们就不能从有启发性的假设和奇闻轶

事的解释中有大的进展，这需要借助于其他社会科学的长期发展出来的研究者和技术手段的分工。与此相反，在分析特殊的个人、小群体和具体情形时，我们同样也需要观察和分析的方法，这在历史学以外的领域中已经有了开拓性工作，也许这正适合我们的目的。例如，社会人类学家参与性观察，深入交谈，甚至心理分析的方法。起码，这些不同方法能够促进我们领域内相应和对等的研究，有助于回答那些费解的问题。

我十分怀疑把社会史看作社会学向过去的投影，就象把经济史看作是经济理论的还原一样，因为这些学科目前并不能给我们提供有用的模式或分析框架来研究长时段“历史的”社会经济变革。如果我们排除象马克思主义之类的思潮的话，这些学科即使与社会经济变革相关，但它们的内容还没有涉及到这些变革。另外，可以说这些学科分析模式的重要方法已经系统化了，其中最为有益的则是那些从历史变迁中概括出的模式。我认为这对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来说显然是正确的。

的确，社会学的创始人比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学派更有历史感，但是，他们的研究同样是不太发达的科学。斯坦利·霍夫曼正确地指出了经济学家“模式”与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清单”的区别，也许它们不仅仅是“清单”。这些科学也给我们提供了某些认识角度，由一些因素组成的可行的结构的模型，其中最好的“结构—功能”模式至少有一些既精致又有启发性的用处。不太过分地说，它们给我们提供了有用的比喻、概念和术语（如“角色”），并给我们提供了整理史料时的便利。

此外，并非这些学科缺乏模式，人们可以认为社会学（或社会人类学）的理论构架在排斥历史学上是最为成功的，那是有方向地或定向地改变历史学。广义地说，结构—功能模式阐

明了各种社会尽管特点相异，但是具有共同之处。而我们的问题关系到结构—功能模式尚未阐明的部分。它不是列维·斯特劳斯研究的阿玛宗部落给现代社会的启发，而是关于人类如何从穴居人发展到现代工业主义或后工业主义的，以及社会的什么变化与这种进步有关，或者产生的必要条件，或者其结果。

在另一方面，当我对最流行的经济理论作为对社会历史分析的框架表示怀疑时，我倾向认为经济学对社会历史学家的潜在价值是很大的。经济学必须研究历史基本的动态因素，即过程——全面地长时段地说，是社会生产的过程。正如马克思看到的，社会生产的进步是由历史发展形成的。当然，马克思知道经济模式如果对历史分析有价值，就不能把它与社会和制度的实际割裂开来，这包含某些人类共同的血缘组织的基本类型，并没有特别涉及独特的社会经济形式或文化结构和假设。还有，尽管马克思被看作现代社会学思想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但是，他的主要的充满智慧的著作《资本论》是采用经济分析的方法。我们并没有被要求赞同他的结论或方法论，但是，忽视这位思想家的实践是不明智的，他比任何人都早地界定和提出了一系列历史问题，对此，今天的社会科学家仍被这些问题所吸引。

三

我们怎样写社会的历史？对我来说，提出一个我这里所指的社会的定义或模式，或者我所要了解的它的历史的清单，这都是不可能的。即使我能做到，我也不知道这有什么好处。然而，为将来的道路提出一个小小的各具特色的分类路标，或许是有用的。